

中華書局成立七十周年紀念專輯

學林漫錄

四
集

学 林 漫 录

四 集

中 华 书 局

1981年·北京

封面题签 叶圣陶
封面设计 曹辛之
编辑者 中华书局编辑部
张忱石 傅璇琮 许逸民

学 林 漫 录
四 集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 8 印张 · 187 千字

1981 年 10 月第 1 版 198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2,600 册

统一书号: 17018·107 定价: 0.90 元

编 者 的 话

这一集《学林漫录》印出时，正好赶上中华书局七十周年的前夕，我们特为此组织了几篇回忆性的文章，并将这第四集作为纪念专辑。中华书局成立于一九一二年年初，也就是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在旧中国它是一个有较大影响的出版社，对传播文化知识和出版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起过有益的作用。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它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七年以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规划小组，从此，中华书局成为一个整理出版中国古籍的专业出版社。从这时候起，中华书局开始有系统有计划地整理出版文史哲等方面的基本古籍，也组织出版现代学者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学术专著，在我国文、史、哲研究和教育领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象这样一个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版过不少有影响的书籍、在国内外有一定声誉的出版社，是应该受到人们的纪念的。从本集刊登的这几篇回忆文章中，读者不难看到，中华书局创办以来的七十年中，经过了怎样的曲折道路。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进入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这前无古人的壮丽事业，激励我们在这神州春暖、百花争艳的时日，更加奋发有为，为祖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日益繁荣兴盛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集另一组回忆老一辈学者的文章，如《可贵的师生情谊》（牟小东）记“五四”时期蔡元培与许德珩的交谊，《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黄永年）、《陈直和他的〈摹庐丛著〉》（王庆祥），以朴实的文字分别记述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和陈直先生的治学道路，都感人至深。《藤花会逸事》（王钟翰）以轻松隽永的笔调写洪业先生过

去在燕京大学的一段生活,颇饶风趣。更值得一提的是《无锡国专杂忆》一文(杨廷福、陈左高)。建国以前,无锡国专培养出不少有成就的文史学者,他们中不少位至今尚在一些教学、科研单位工作,作出新的贡献。这是一所有特色的专科学校。杨、陈二先生的文章是迄今为止唯一详尽的记述无锡国专的文章,值得向读者推荐。

本集的《吉川幸次郎与“吉川中国学”》一文(严绍璦),对日本著名的研究中国学专家吉川幸次郎先生,作了介绍。吉川幸次郎先生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深有研究,他的论著对中国学者是有启发的。我们今后还拟陆续刊登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关于中国文史研究情况的介绍文章。吴小如先生的《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全稿约有数万字,《学林漫录》拟连续刊登,第一篇已刊于二集,是谈谭鑫培的,本集发表的一篇主要讲余叔岩。我们相信,小如先生的这一组文章,一定会引起京剧爱好者的极大兴趣,即使对京剧的发展不大懂行的,作为艺术欣赏,读来也能益人心智。

本集“书评与书讯”专栏刊登了四篇文章,分别介绍了中华书局的出书情况和出书计划。其中《开展中国佛教重要典籍的整理出版工作》一文(陈金生),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整理中国古代佛教史料的设想,很值得重视。在建国三十余年来的哲学史研究和古籍整理中,佛教史料的整理、研究和出版,是薄弱的环节。中华书局在今后几年内有计划地出版这一方面的书籍,是会受到读者欢迎的。《学林漫录》问世以来,得到许多读者和学术界人士的支持和鼓励,我们愿意再接再厉,把它办得更丰富、更充实、更活泼些,诚挚地希望关心本刊的同志们,继续给以帮助和指导。

目 录

回忆灿然同志	李 侃 (1)
我在中华书局三十年	金兆梓遗稿 (16)
我所知道的中华人	吴铁声 (24)
在中华书局服务的回忆	钱歌川 (39)
片断回忆业师陈乃乾	胡道静 (45)
可贵的师生情谊	牟小东 (53)
——记蔡元培和许德珩	
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	黄永年 (64)
陈直和他的《摹庐丛著》	王庆祥 (76)
藤花会逸事	王锺翰 (81)
无锡国专杂忆	杨廷福 陈左高 (85)
坚净居题跋	启 功 (95)
《离骚》是什么时候作的	周振甫 (102)
《世说新语》札记	白化文 (110)
读《东京梦华录注》小议	孔宪易 (119)
张岱《琅嬛文集》跋	黄 裳 (124)
谈谈几种油印书册	郑逸梅 (131)
陈从周《书带集》序	俞平伯 (137)

葛洪文艺思想的一个矛盾	施昌东 (139)
“乌纱”还是“乌鸦”?	邓绍基 (144)
马谡被杀的真相	朱大渭 (149)
徐福东渡	汪向荣 (154)
吉川幸次郎与“吉川中国学”	严绍璎 (164)
京剧老生流派综说	吴小如 (173)

书评与书讯

开展中国佛教重要典籍的整理出版工作	陈金生 (194)
查检二十四史人名的工具书	何 蓀 (199)
《真腊风土记校注》简介	徐莘芳 (204)
满铁和《满铁史资料》	林 南 (208)

王弼著作首次编集校释 (38) 《辛亥革命史丛刊》创刊问世 (94)
 泪和血的记录 (130) 《韩诗外传集释》出版 (138) 《清代职官年
 表》简介 (172) 王力先生的论文集 (207)

古籍丛谭

《戒庵漫笔》杂谭	魏连科 (215)
朱彭寿和他所著的两种史料笔记	何双生 (222)

文史哲研究工作者简介	(228)
------------------	-------

于省吾 (228) 周振甫 (229) 黄永年 (230) 曹道衡 (230)

陈贻焮 (231) 施昌东 (231)

古籍与学术著作书目 (1980.7—12)	(233)
-----------------------------	-------

回忆灿然同志

李 侃

到一九八二年元旦，就是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的纪念日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活到七十岁要算“高寿”。一个出版社，能够经历七十个寒暑，跨越新旧中国两个历史时代，在饱经忧患、历尽沧桑中生存、发展、衰落、新生，并且以整理出版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为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开辟着美好广阔的前途，这也是很值得纪念，很值得庆幸的了。

中华书局在它成立以来的七十年当中，无论是新中国诞生以前的三十七年，还是建国以后的三十三年，都有许许多多的编辑、校对、排版、印刷以及其他各种不同岗位上的职工，日夜辛劳，埋头苦干；同时也有不少书局的主持人，为祖国和人民的文教事业，为做好书局的工作，而兢兢业业，尽心竭力。在这些历代的主持人当中，我作为中华书局晚辈职工的一员，怀着尊敬的心情，怀念金灿然同志。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央文化部作出决定，规定中华书局是以出版我国古籍和当代文、史、哲研究著作作为主要任务的专业出版社。曾经担任过出版局副局长的金灿然，调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兼总经理。在此以前，同年一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以齐燕铭同志为首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金灿然既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又兼任小组的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既是出版单位，又是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

我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到中华书局的。从这时开始，就认识了金灿然，并且在他直接领导之下工作了八年之久。一九六六年六月，“史无前例”的十年大动乱开始了，他和我都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工作。不过，直到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他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而死，我们一直是一起在那昏黑苦难的岁月中熬煎。令人哀伤惋惜的是，他没有等到熬出头来，就在悲愤和寂寞中与世长辞了。不然的话，他若是能够活到今天，亲眼看到林彪、“四人帮”覆灭的可耻下场，看到社会主义的阳光又普照祖国大地，他费尽心血、苦心经营的中华书局，也在科学的春天恢复了勃勃生机，他那纯朴浑厚的面颊上又该浮现出充满喜悦的笑容吧！

我和金灿然第一次谈话，是我到中华书局向他报到。在东总布胡同十号大院他的一间设备简陋的办公室里，天气很热，他穿着一件半旧的针织圆领汗衫，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操着山东口音向我简单地谈了中华书局的方针任务和人员情况。我表示自己对整理古籍一无所知，对编辑出版工作也完全是外行。他说：“那就边干边学吧，只要你有兴趣，决心干这一行，是可以慢慢熟悉的，也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神秘，只要肯下工夫，就能学会。”他笑了笑，又说：“说实话，干这一行，我也是个半瓶醋，可是我感到做这个工作比在出版局工作更有意思。”经过这次简短的谈话以后，我就被分配到近代史编辑组。

当时的中华书局是刚刚从财经出版社分出来，与古籍出版社合并不久。办公地点就在十号大院东北角的一个自成院落的小四合院里。全部工作人员不超过五十人。编辑部分成四个编辑组，文学组的组长是徐调孚，古代史组的组长是姚绍华，近代史组的组长是张静庐，哲学组的组长由副总编辑傅彬然兼任。刚到书局，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老年人太多。那时候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出版社也在鼓干劲、争上游、搞竞赛。“反右派”的斗争虽然

基本结束，可是余波未息，又搞起什么“拔白旗”。因此会议是很多的。因为没有礼堂，也没有较大的会议室，每次全体职工大会就小院的天井里开，人们有的坐在台阶上，有的搬个凳子坐在角落里，有的坐在窗台上。一眼望去，不是秃头顶、长胡须，就是驼背腰。青年人简直寥寥可数。再就是南方人、特别是江、浙人多。开会发言或平时谈话，经常听到的是江南口音。我心想：这恐怕就是整理出版古籍编辑队伍的特点吧。同时又想：靠这支“老弱残兵”能够担负起整理出版古籍和学术研究著作的任务吗？想到这里，真有点暗暗替金灿然着急。可是，据我侧面观察，金灿然不但不着急，反而象是有些“悠然自得”从容不迫的样子。他有时参加全体职工大会，坐在那里听一些同志在“挑战竞赛”中发表的豪言壮语，他只是若无其事地笑一笑，既不给大家泼冷水，也不给大家鼓劲加油。我想，他真沉得住气。不久，我就发现，我的那种忧虑和焦急是多余的；我对金灿然的观察也是一种错觉。就在这时，他正在和齐燕铭同志不断地研究计议，并且积极与学术界人士联系，争取有关领导部门的支持，从落实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和充实、培养编辑干部两个方面，来着手加强中华书局的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华书局的面貌改变了。

一九六一年十月，书局从东总布胡同的小四合院迁移到西郊翠微路二号大院。这里原来是文化学院的校舍，在文化学院之前是农业大学的旧址。有宽敞明亮的编辑室，有整洁方便的图书馆和阅览室，有花木成行、绿树成荫的庭院，在庭院周围有职工的宿舍，环境是幽美而安静的。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小事”，金灿然患有高血压症，医生叫他多活动，于是他就在工余之暇，养花种树，慢慢地他懂得了许多有关花木的习性和栽培知识，并且养成了养花植树、美化环境的习惯。搬到翠微路的第二年春天，他就弄来了许多花木树苗，把个宽阔的庭院，打扮得更加整齐幽美。一些熟识的

朋友，看到书局的变化，往往要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金老板真
有办法，中华书局真的是鸟枪换炮了！”其实，书局的最大变化还不
在于它的工作环境和物质条件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业务的开展、
队伍的充实壮大和它与学术界联系的加强、影响的扩大。拿领导
班子来说，三年之中先后调来了曾任全国教育工会副主席、当过之
江、大夏大学历史教授的萧项平同志和曾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
编辑的丁树奇同志来担任副总编辑；调曾任高等教育出版社副社
长、具有多年出版工作经验的梁涛然同志来任副总经理。曾任人
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在历史学方面很有造诣的巩绍英同志，也调
来参加书局的领导工作。与此同时，编辑干部的状况也发生了显
著的变化，除了原来的几位出版界知名人士和有丰富经验的老编
辑如徐调孚、张静庐、卢文迪、章锡琛、陈乃乾、曾次亮、姚绍华等
人之外，又先后调来了宋云彬、杨伯峻、马非百、傅振伦、孙人和、
马宗霍等学有专长的专家。陆续补充了一些业务水平较高的青年编
辑和大学毕业生。在出书方面，先后出版了《册府元龟》、《永乐大典》、
《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
诗》、《国榷》、《明经世文编》、《宋会要辑稿》以及其他许多重要的古
籍和专题资料。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继《史记》、《三国志》出版之
后，已全面铺开，聘请了著名史学家郑天挺、唐长孺、王仲荦、刘节、
卢振华、张维华等来书局和在京许多史学家分工合作进行整理。
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到一九六三年，也已出满了一百种。
一九六〇到一九六七年的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中所列的各种项
目，基本上都已落实，并且陆续完成。中华书局这个旧的出版企
业，又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了。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虽然有
一段时间正是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期，物质生活条件是很艰苦
的，但是书局的工作和生活却是充满活力和愉快的，政治空气和学
术空气也是健康的、活跃的。直到现在，不少同志在追忆“翠微路”

前几年的工作和生活，还感到那是解放以后中华书局的“黄金时代”，是令人感奋和怀念的年代。

如今，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想起和金灿然同志相处的日子，想起他为了办好中华书局而呕心沥血、日夜辛劳的情景，想起他认真严肃的工作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想起他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愧如昨日。然而，要对他在主持中华书局期间的工作，做一个全面的回顾，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力不从心的事，甚至不知从何说起。在灿然同志生前，我虽然和他接触较多，但是却从未听到他说过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成绩，有什么经验，和有什么“诀窍”之类的话。他很少或没有作过长篇大论的报告、演讲，也很少写文章。他对于个人的名利得失，可以说是很淡泊的，可是在这种“淡泊”之中，却有着一颗炽烈的事业心。只要是在书局和他共事时间较久的人，都会对他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他是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都倾注在怎样办好中华书局上面了。如果后人在谈起中华书局变迁史的时候，也要评论主持人的是非功过，那么，我敢说，公正的历史是不会让他辛劳成果，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泯灭的。

主持一个出版社的工作，固然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业，也说不上“千头万绪”，但是也不能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简单容易的事情。单是书籍的生产过程，就要经过确定选题、组稿、审稿、加工、发稿、排校、印制等许多工序和环节，此外，还有政治工作、人事工作，职工生活和经营管理等许多问题。在这种头绪纷繁、事务丛集的日常工作中，金灿然是怎样工作的呢？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着重抓了三件大事。

他始终不懈、抓住不放的第一件事就是出书。办出版社要出书，这本来是人所共知、不成问题的事情，然而出什么书、怎样出书，这里面就大有文章、不那么简单了。根据中华书局的方针任务和业务分工，金灿然在出书问题上，是集中力量抓住两个环节：一

是规划；二是质量。他到中华书局办的头一件事，就是和齐燕铭同志一起，取得许多学术界知名人士和专家的支持协助，分别制订了古典文学、中国历史和古代哲学三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草案。这三个规划草案中所开列的古籍书目有数千种，几乎可以说是把经、史、子、集的重要古书都包罗在内了。它的好处是全面、系统而又有所选择，缺点是数量太多、重点不突出，要求不明确，很多项目短期内难于落实。因此，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反复研究讨论和多次修改，又在一九六〇年制订了《三至八年（一九六〇——一九六七）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草案）》。在这次制订规划的过程中，他和齐燕铭亲自动手，对整理古籍的指导思想作了明确的规定，对每一类古籍，也都根据不同的内容和不同读者的需要，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具体的整理办法。为了落实规划，对一些重要项目，请什么人整理，什么时候完成，几乎是逐项研究，逐项落实。

金灿然反复强调，整理古籍决不是单纯的圈圈点点的技术性工作，而是要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理。齐燕铭曾提出：凡是列入重点规划的重要古籍，都应经过精心整理和不断修订完善，使之成为同书所有版本中最好的本子，力求成为“定本”。为了保证出书质量，金灿然一再提出要把中华书局办成学术机关，要求编辑干部一定要刻苦钻研，成为内行。他要每个编辑处理一部经过整理的古籍，首先要对本书的内容有个基本的了解，每部重要古籍出版，最好能够结合本书的内容及其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写出分析中肯、评价得当、情况清楚、文字通畅的序言或出版说明；如果一时还写不出这样的序言或出版说明，那么，至少也要对书籍作者的生平、成书经过和成书年代、前人对本书的整理和评论以及版本源流、整理情况等等，交代清楚。每当一种书出版之后，他不但要抽看整理质量，有时还要对装帧设计等提出具体意见。这里顺便举几个例子，看他是怎样重视书籍质量的吧！

一九五九年，为了影印《册府元龟》，他通过各种途径，把能够找到的各种版本的《册府元龟》都借了出来，然后约请专家唐长孺加上书局的陈乃乾、赵守俨等，介绍情况、比较各本的长短、异同，经过认真地研究讨论，才决定以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所收藏的崇祯初印本为主，参用北京图书馆、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周邠同志等所藏的四部较好的印本，逐叶比对，细心整理，作为底本，照相影印。一九五九年，为了编辑出版《海瑞集》，他指定当时的青年编辑程毅中同志承担这个工作，并对编辑要求、体例等提出具体意见，程毅中经过查阅各种有关海瑞的著作的版本，广泛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和搜集资料，终于编成了迄今为止最完备、最齐全的《海瑞集》。金灿然很高兴地对程毅中说：“你可以称得起是研究海瑞的专家了！”有些他自己感到没有把握的书稿，送到他那里，他决不冒然签字发稿，或者自己找来许多参考书弄清情况，提出问题，或者送请研究有素的专家审阅。在他审阅书稿时感到有什么问题，就在书稿里夹上纸条，他找编辑组长或责任编辑到他那里谈对某种书稿的处理，就会看到，在他看过的书稿里夹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纸条子，他根据这些条子上记明的问题，逐一询问、逐一商量解决。总之，他的那道“关口”是很不容易通过的。中华书局新老编辑，在处理书稿过程中，没有被他“留难”、“询问”，甚至批评的人是很少的。这里使我想起了至今难忘的一件事。一九六〇年夏季，我当时签发了一本《中国历史小丛书》中的《诸葛亮》的稿子。我在通读原稿之后，觉得史事写得还清楚，文字也比较活泼生动，又是经过小丛书编委会讨论通过了的，于是就签字发稿了。送到金灿然那里，他说他先不看了，等排出校样再看。不久，清样校改完毕，送他签字“付型”，他把我找去，劈头就问：“《诸葛亮》这部稿子你看了吗？”我说：“看了。”他又问：“你看有什么问题？”我说：“我看写得不错，没有什么问题。”这时，他忽然有些严肃起来了，说道：“这部稿子里有好几个

地方说到荆州，你说说三国时期的荆州都包括那些地方？”这下子可把我问住了，我只好承认：说不清楚。于是他一手拿起校样，一手拿着铅笔，指着校样对我说，稿子里面几个地方讲到荆州的地理概念，前后不一致，而且相差很大，文字叙述和地图的画法也不一致。然后，他说经他查对一些参考书和历史地图，三国时的荆州都包括那些地方。这时我才发现，他的桌子上堆着好几本有关三国的参考书和历史地图，校样上划了好几个？号和铅笔杠杠。最后他说，这部稿子要修改，地图也要重画，又说：“不要因为普及读物就马马虎虎，要给青少年准确的历史知识，讲历史知识不准确，会以讹传讹，贻害青年的。”我被他严肃认真的精神所打动了，当场向他检讨了自己粗心大意的毛病。

有一位青年编辑负责处理的一部书稿，作者在书中多处引用苏联一本教科书上的话，用来证明自己的论点。金灿然在看了稿子以后，找这位同志说：写文章或写序言，在必要的时候，适当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点，来说明和印证某些理论问题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却不能轻易引用外国教科书上的话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和助力，因为教科书并不是研究著作，引用外国教科书上的话，不但不能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反而可能降低自己的研究水平。他的这个意见，使这位同志感到很受启发，很有帮助。诸如此类的事例，是很多的。

金灿然身为总编辑，确实是为如何出好书绞尽了脑汁，付出了极大的精力。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谈谈古典文献整理与出版的问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就如何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整理古典文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同古籍的不同读者；古籍整理的现状和前景等几个问题，作了扼要的论述。这实际上是对古籍整理和中华书局的工作带有方针性、指导性的文章。为了把方针和规划变成现实，他和书局的全体同志一起，同心

同德、脚踏实地地努力工作。怪不得在一九六二年初纪念中华书局五十周年的时候，有的同志写了一篇通讯，题为《为书辛苦为书忙》。我想这个题目是颇为真切地说出了金灿然和书局编辑们的工作和精神面貌的。

然而，以出书为业，以出好书为乐的安定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翠微路大院并不是象后来有人描绘的“芙蓉镇”和“世外桃源”。一九六四年，开始了政治风云的变幻。书局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员到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文化部因为被说是成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还有什么“死人洋人部”而开始了“整风”，而被整的主要对象之一，则是对中华书局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最热心、最积极的指导者、支持者齐燕铭同志。金灿然作为中华书局的主要负责人和齐燕铭的亲密朋友，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中，他能不感到惶惑和恐惧吗！

整理出版古籍和文、史、哲研究著作，甚至出版普通的历史书，如果抛开“帝王将相”和“死人”，那该怎么办呢？金灿然当然没有本领解决这个难题。结果，书是越出越少、越出越难了。有些书已经整理好了、甚至已经排版或付型了，有些莫名其妙地改为“内部发行”；有些只好存放起来，暂不出版。同志们也开始觉察到政治气候开始变了，金灿然也不象以前那样开朗活跃了。他的“胆子越来越小”，甚至变得“谨小慎微”沉默寡言了。过了不到两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次灾害，用急风暴雨来形容已经远远不够了，它仿佛是在整个中国大陆上发生了一场强烈地震，一下子天昏地暗，乾坤翻转。中华书局和金灿然的八年心血，在“横扫”和“砸烂”声中濒于毁灭。“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也罢，“内部发行”、“暂不出版”也罢，所有这些，都没有使中华书局和金灿然幸免于难。八年心血，尽付东流；无数艰辛，都成恶梦。彼时彼地，谁也不能预卜，在神州大陆，是不是还能容纳一个中华书局；在未

来的年代，是不是还会有人记起金灿然？浩劫过后，砸而不烂的中华书局，又要迎接自己的七十岁生日了，我也可以在这里信笔直书怀念金灿然的文字，抚今追昔，不禁感慨系之。话扯远了，现在回过头来，再说金灿然着重抓的第二件事。

金灿然抓紧不放的第二件大事，简括言之，就是队伍建设和干部的培养。“知人善任”、“选贤与能”；“登用贤俊”、“乐育英才”这些褒辞，加在金灿然头上虽然与他的身分、地位是不相称的，而他也根本无意得此“美名”。不过至少可以说他是很重视人才、很爱惜人才，而又很善于团结人、使用人、关心人、培养人的。与我同时到中华书局的还有从商务印书馆古籍编辑室调来的章熊、周云青、郝光炎等人。有一次他问我，商务能搞古籍整理的还有什么人，我说有一个中年人叫赵守俨，他虽然没有什么著作，也没有什么名气，但是，据我所知，这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古籍不但知识广博，而且工作认真细致、干净利落，对中华书局是个不可多得的编辑。我还举出他过去处理过的一些书稿为例，来说明我的看法。他当时似乎将信将疑，表示不妨调来试试。不久，果然把赵守俨调来了，经过几次工作的考验，金灿然对赵大为激赏，很快就任命他为古代史编辑组的副组长，并且负责草拟整理二十四史的具体方案和组织工作。他后来私下对我表示，如果书局多有几个象赵守俨这样的人，工作就好办得多了。他还曾不止一次颇有些内疚地对我说过，说自己在出版界的负责岗位上工作了许多年，辛辛苦苦、忙忙碌碌，成绩和缺点都不能说没有，但是他认为他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下决心有计划地培养出一批编辑干部。他举出平素为他十分尊敬的范文澜同志培养干部的事例来自我谴责，他说：范老进城以后，在继续修改和编写《中国通史简编》的工作中，有意识地选择和带动、培养了一批青年研究人员，很有成效。也许是从他自己感到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或是出